

就事論事與不就事論事 ——我看《懷柔遠人》之爭

• 葛劍雄

《二十一世紀》先後發表了周錫瑞 (Joseph Esherick)、艾爾曼 (Benjamin Elman) 和胡志德 (Theodore Hutters)、張隆溪的觀點各異以致針鋒相對的文章，張隆溪的文章還引述了我的觀點。這些文章以及它們所討論的何偉亞 (James Hevia) 的《懷柔遠人》，都是涉及中國歷史或與研究中國歷史有關的問題，但參與者卻大多是沒有生活在中國的，所以我覺得無論如何應該說幾句話，儘管中國的「後現代」或「前現代」學者或許都會反對我的意見，當然更談不上作他們的代表了。

但讀了艾、胡二位對周錫瑞的反批評文章後，特別是看到他們對周錫瑞「向『後現代』宣泄惡意」的指責和「周錫瑞對何偉亞的批評如果機遇好，大概還會得到來自各個政治陣營的許多名人及領袖們的首肯，比如亞當斯密、黑格爾、馬克思、嚴復、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福山、克林頓乃至江澤民」這樣的政治判斷以後，我也有些猶豫。首先，我根本不認識何偉亞、艾胡二位和周錫瑞，此前亦沒

有讀過他們的論著；張隆溪雖在哈佛燕京時見過幾次，也已十多年沒有聯繫，誰知道他們是哪一派？「後」還是「前」？要是機遇不好，撞上那一派的槍口，豈不自討晦氣？其次，我手頭沒有《懷柔遠人》的原版書，自然無法像他們那樣作逐字逐句的討論，更難作中、英兩種文字間的對勘。

不過我還是主張，討論問題不妨就事論事，不必扯得太遠。看一個觀點、一句話是否正確，可以不問持有此觀點或說此話的人是誰、有甚麼身分、代表哪一派。批評一本書、一個觀點，同樣不要動輒與「後現代」、「前現代」聯繫在一起。當然，我絕不反對就某種學術流派、某種思想體系進行評價或討論，但這至少應該在具體問題討論出一個結果來以後，而不是先入為主，因人、因派立言。既然是討論《懷柔遠人》，應該先就書論書，對批評或讚揚的人都不必問是甚麼派。或許我說的完全是外行話，但我相信《二十一世紀》的多數讀者還是像我這樣的外行。

讀了《二十一世紀》上討論何偉亞的《懷柔遠人》的幾篇文章後，覺得無論如何應該說幾句話。我主張，看一個觀點、一句話是否正確，可以不問持有此觀點或說此話的人是誰、有甚麼身分、代表哪一派。批評一本書、一個觀點，同樣不要動輒與「後現代」、「前現代」聯繫在一起。

看到諸位用頗多篇幅討論中國傳統的考據之學，老實說，我看不出有甚麼特別或高明的地方。能識字看書並能正確理解史料含義的人，未必就會產生高明的見解；但連字面意思都不能正確理解的人，他的高見又從何而來？我想對「懷柔遠人」及有關的詞彙應該這樣來理解。

馬嘎爾尼像



記得文化革命初期馬路上的「大辯論」，參加者先要自報家門、甚麼出身、甚麼身分，然後才能發言。又記得當年如要批評某一句話或某一個人，先得弄清他的身分或背景，否則，說不定會被套上一頂「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態度問題」或「矛頭指向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大帽子。同樣一句話，此人說了就是真理，彼人講了即成反動。這次看到諸位的筆仗，不知為甚麼，使我想起了這些舊事。

至於「來自各個政治陣營的許多名人及領袖們」的機遇，我看還是不要考慮為好。真有這樣機遇的話，或許何偉亞的書比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的書更會得到毛澤東的青

睺。要是這本書早出二三十年，說不定我們不得不多學一條「最高指示」。這自然只是一種假設，請不要當真。但我寧可相信這一段話有翻譯上的錯誤，否則艾胡這兩位張隆溪所「敬重的學者」何至於將亞當斯密、黑格爾、馬克思、嚴復、陳獨秀、毛澤東、鄧小平、福山、克林頓與江澤民這些價值觀念截然不同的人物列在一起？試問二位能舉出哪種這些人物都一致讚賞或反對的觀點來嗎？

即使諸位不同意我的意見，我也請求對我的文章網開一面，就事論事。因為我只想對《懷柔遠人》的一個基本估價說一點看法，而不準備對它可能代表的「後現代」說三道四。不過，對於研究中國的歷史，就事論事就不夠了，我想研究其他歷史也應該如此。

各位用頗多篇幅討論中國傳統的考據之學，老實說，我看不出有甚麼特別或高明的地方。對中國學者、特別是史學家來說，這本來就是常識。能識字看書並能正確理解史料含義的人，未必就會產生高明的見解；但連字面意思都不能正確理解的人，他的高見又從何而來？一個不懂英語的人要研究英國歷史，雖然不是絕對不行，卻完全取決於有沒有合格的翻譯，要不豈非胡鬧？就是讀懂了文字，還只有就事論事的本領，何況確實還沒有完全讀懂？

譬如「文化大革命」，從字面上說，無論如何革命、如何大，總不會超出「文化」的範圍吧！要翻譯也罷，考據也罷，只能在「文化」上做文章。只有了解這段歷史真相並對中國歷史有所了解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這個「文化」的含義。類似的例子，在中國歷史研究中可謂不勝枚舉，我想對

「懷柔遠人」及有關的詞彙應該這樣來理解。

要評價乾隆對待馬嘎爾尼來訪的態度是否合理，措置是否恰當，當然要仔細研究具體的史料。但更重要的，是從整體上理解乾隆及清朝政府如何對待外國的觀念，以及產生這種觀念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我曾經在《二十一世紀》上發表過〈天朝心態中的開放觀〉一文^①，對自秦漢以來至近代中國傳統的天下觀作過分析，而在《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中亦作過進一步的論述^②。對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一事，我也曾在《讀書》上發表過〈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和〈世界上不止有中文〉，在後一篇中還專門將故宮檔案《英使馬嘎爾尼來聘案》與根據英文原本翻譯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作過對勘，並對此事作了歷史性的分析^③。為了讓更多讀者、特別是青年能夠了解這段歷史，我沒有將這兩篇文章寫得過於學術化，因而大概沒有被當作中國學者的研究而受到外界注意，所以得感謝張隆溪這次正確的引述。但在國內，某位「學者」在《原道》第二輯一篇文章的註中已經表示反對我的觀點，只是沒有說明具體理由。

簡言之，從春秋戰國開始形成的、以中原為中心的天下觀和與此相應的「華夷之辨」，經過秦漢以來歷代中原王朝的強化，已經變得根深柢固，不受到激烈的衝擊是不可能輕易改變的。即使由於軍事上處於劣勢而不得不接受城下之盟，或者實際上不得不承認對等的或臣服的地位，在自己內部卻只當成是對「夷狄」的懷柔和羈縻，心態上更是如此。如北宋對遼、金，南宋對金、蒙古和元。但由於入主中原的非漢族又以「天下之中」或正統的華夏繼承人自居，這種天下

觀卻絲毫沒有改變，只是換了主人而已。

唐太宗出身在一個非漢民族大量移居中原並與漢族廣泛通婚的時代，連他本人的家族也具有「胡人」血統。在歷代帝王中，他對「夷狄」的觀念是最積極、最開放的。如他認為：「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但其前提還是「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還是他視「四夷」為赤子，而「四夷」對他如父母^④。與那些實際上視「四夷」為禽獸的人相比，唐太宗無疑是值得稱道的，他將「四夷」與自己的百姓一視同仁，至少在理論上已經承認。但他絕不會承認自己與「四夷」的首領、唐朝與「四夷」政權存在兄弟關係，享有平等的地位，所以這之間只能是父子關係，他就是以慈父自詡，而希望「四夷」能當孝子。

我們當然不應苛求古人，因為產生這樣的天下觀是很正常的，符合人的認識規律。直到工業革命在西方出現之前，中國所擁有的物質和精神文明使她很自然地成為東亞以至整個東方的中心，她從來沒有受到外界真正的挑戰——有哪個在經濟和文化上都處於更大優勢的民族或政權能夠改變這種觀念，或者進而征服中國？入主中原的非漢族，最終毫無例外地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就是乾隆本人，當他統治着清朝一千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和四億人口時，他首先也是以堯、舜、禹的後代和秦、漢、唐、宋的繼承人自居，而不僅是作為滿洲愛新覺羅家族的後裔。

十五世紀後，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播了一些西方文明，但他們能接觸到的中國人是極其有限的，其中能夠稍為理解的人就更少。乾隆的祖父康

無論馬嘎爾尼使團和英國政府出於甚麼目的，對乾隆來說，只不過是一次接受「遠夷」的進貢。他對馬嘎爾尼使團的接待方式、他所堅持的禮儀（包括必須行叩頭禮），都不是他別出心裁，而是當時以至千百年來的通禮定制，既不是對英國人的優待，也不是甚麼歧視。

當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訪華，並預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中與他會見後，我聽到的上海市黨政幹部的傳達報告就稱這是「帝國主義的頭目終於打着白旗到中南海投降了」。這事例應該能幫助人們想像，當年乾隆「懷柔遠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熙或許是清朝統治者中最開明的一位，但他對西方文明的接受也僅限於具體的自然科學和技術，更何況在傳教士基本被逐的乾隆時代和遠不如康熙開明的皇帝？

無論馬嘎爾尼使團和英國政府出於甚麼目的，無論這次使命的歷史作用如何，對中國而言、尤其是對乾隆來說，這只是一次接受「遠夷」的進貢。之所以要特別隆重，是因為來者聲稱補行「恭賀萬壽」之禮，而該國在萬里之外又主動請求來朝，這足以證明天朝的威望的確已經「無遠弗屆」。今天我們批評乾隆如何頑固保守也罷，讚揚乾隆如何明智正確也罷，其實都是太抬舉了他，因為他對馬嘎爾尼使團的接待方式、他所堅持的禮儀（包括必須行叩頭禮），都不是他別出心裁，而是當時以至千百年來的通禮定制，既不是對英國人的優待，也不是甚麼歧視。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幾次如何接待「外藩」或「夷狄」首領的爭論，如西漢後期對如何處理匈奴單于「入朝」^⑤，唐太宗時如何對待突厥等族的降人^⑥，但對接待馬嘎爾尼「來朝」一事，乾隆朝野毫無異議，以致到本世紀30年代，大學歷史教授還在課堂上引述史料，證明乾隆的「天威」使馬嘎爾尼最終不得不雙膝下跪^⑦。

這種觀念和心態，不僅長期存在於中國統治者心中，在中國民間也具有廣泛的基礎。文化革命初期，來訪的外賓是否佩戴毛主席像章、有否手持「小紅書」（《毛主席語錄》）、開口是否先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一度成為判斷他是否友好的標準。當美國總統尼克遜決定訪華，並預定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書房中與他會見後，我聽到的上海市黨政幹部的傳達報告就稱這

是「帝國主義的頭目終於打着白旗到中南海投降了」。毛澤東本人和少數中國領導人或許清楚尼克遜來訪的真實意義，但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項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的偉大勝利卻着實陶醉了一番。與此同時，上海又作了空前規模的隆重準備，連美國人根本不可能到的地方都盡最大的努力作了清掃和粉刷，儘管接待的方針也是「不卑不亢」（這是乾隆當年上諭中就用過的話）。這些事例應該能幫助人們想像，當年乾隆「懷柔遠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或許有人可以舉出他們的甚麼新發現，來證明乾隆有過與傳統做法不同的「駕馭外藩」之道。但根據我對原始資料的理解，實在看不到這種迹象。而且，任何正確的判斷和舉措都是以全面正確了解情況為前提的。但實際上，乾隆及其身邊的大臣根本不了解馬嘎爾尼的真實意圖，對英國也幾乎一無所知。他們都不懂英文、拉丁文或任何一種西方語言，而全部英方文件的翻譯又被有關官員下令按中國的慣例作了歪曲性的改寫^⑧。不用說甚麼「工業革命」、「東印度公司」、「自由貿易」、「資本主義擴張」，就是連英國究竟在哪裏、有多大，他們也不知道，又怎麼可能採取「針鋒相對」的態度呢？在乾隆及其臣工們的眼裏，馬嘎爾尼一行無非想以祝壽進貢為名，撈取天朝的好處，並提出了非分之想，表現得桀驁不馴，因此必須既以「天威」加以震懾，又要用厚賜來懷柔。正因為如此，在關係到天朝體制的方面，那怕是一些細微末節，也難以通融，而對經濟利益則毫不計較，給予的各種「賞賜」和允許免稅出口的商品數量都大大超過了英國人的願望。至於在叩頭問題上的變通，只

是乾隆不想把這件已人盡皆知的「遠航祝壽」太平盛事弄成不愉快的結果，掃了自己的興，對英國這樣從未沾染過王化的「遠夷」也不值得過於認真。還應該指出：馬嘎爾尼最終沒有行叩頭禮的事，除了乾隆與英國人之外，在中國極少有人知道，並未造成甚麼影響。我很懷疑知道的人被要求保密，或者命令他們作相反的傳達，所以才會有寫出歌頌「天威」使英夷身不由己地下跪的詩句來。這就像文化革命期間我們經常能聽到國際形勢如何大好，洋人如何被中國折服的「內部報告」一樣。

實際上，直到鴉片戰爭爆發時，乾隆的孫子道光皇帝和滿朝大臣對英國的了解依然相當可憐，以致連起碼的判斷和準備都不可能。關於這些，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一書已經作了非常客觀而規範的學術性論述^⑨，我就不必多說了。

最後，鑒於諸位都談到了史料的發現和解釋問題，我還想說幾句話。新的發現不一定來自新的史料，這一點我完全贊成。但任何新的發現都必須建立在該史料所涉及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中國以往的官方史料、書面記錄往往與實際相差甚遠，甚至會截然相反，例如「款服」很可能是用金帛美女換來的，「去思碑」的對象往往是一位貪官，安居樂業的實際完全可能是家破人亡。但是史料與實際的差異又各不相同，如果一味作毫無依據的推斷就難免失之公允，自我陶醉的「新發現」很可能成為一個笑話。

中國人和懂中文的人研究中國歷史，未必都比洋人或不懂中文的人高明，但不了解中國的歷史事實、連對史料的字面意義都不能正確理解的

人——不管他是那一國的——又怎麼能得出科學的結論呢？

註釋

① 葛劍雄：〈天朝心態中的開放觀〉，《二十一世紀》，1993年2月號，頁11-15。後經修改後收入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221-30。

② 葛劍雄：《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北京：三聯書店，1994）。

③ 葛劍雄：〈要是世界上只有中文〉、〈世界上不止有中文〉，《讀書》，1994年第7期、第11期。

④ 《資治通鑑》，卷一九五，〈唐紀〉十一，太宗貞觀十三年；卷一九七，〈唐紀〉十三，太宗貞觀十八年。

⑤ 見《漢書》，卷八，〈宣帝紀〉及卷九十四，〈匈奴傳〉。

⑥ 見新、舊《唐書》中唐太宗本紀及有關傳記。

⑦ 此事記得見於周一良的回憶錄〈畢竟是書生〉，連載於北京的《史學理論研究》雜誌，洪業（煨蓮）教授上課時引《蘊山堂集》詩句加以證明。但客居無書，無法註得更具體。如誤記，亦請諒解。

⑧ 詳見前揭發表在《讀書》的拙文。

⑨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三聯書店，1995）。

馬嘎爾尼最終沒有行叩頭禮的事，除了乾隆與英國人之外，在中國極少有人知道，並未造成甚麼影響。我很懷疑知道的人被要求保密，或者命令他們作相反的傳達，所以才會有寫出歌頌「天威」使英夷身不由己地下跪的詩句來。這就像文化革命期間我們經常能聽到國際形勢如何大好，洋人如何被中國折服的「內部報告」一樣。

葛劍雄 浙江紹興人，1945年生於湖州。復旦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該校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著有《西漢人口地理》、《統一分裂與中國政治》、《統一與分裂：中國歷史的啟示》、《中國人口發展史》、《中國移民史》（合著）等及中國史、人口史、歷史地理論文多篇。